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8i10.27151

Research on language planning for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frame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Hongbo Lei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3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for childre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consists of three components: 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practice,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all of which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these children. The language choices faced by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bilingual families, but due to the special language needs of the children, their language planning is more explicit and has a more direct influenc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for childre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include: the child's hearing level and language ability, opinions from professionals, family language conditions, national language ideology, and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is a dynamic process that adjust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conditions, which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and guiding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Keywords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language choice; language ideology

听障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框架、特点与影响因素

雷红波

上海大学，中国·上海 200333

摘　要

本文探讨了听障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特点。家庭语言规划包括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三个组成部分，对听障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听障儿童家庭面临的语言选择类似于双语家庭，但由于儿童的特殊语言需求，其语言规划更为显性且影响更为直接。影响听障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的主要因素包括：儿童的听力水平和语言能力、专业人士的意见、家庭语言条件、国家语言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研究发现，家庭语言规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随着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调整，这对理解和指导听障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家庭语言规划；听障儿童；语言选择；语言意识形态

1 引言

在听障儿童的语言发展过程中，除了听力康复技术干预之外，家庭语言规划（Family Language Planning，简称 FLP）干预对他们的语言发展也非常重要。技术干预主要是医生等专业人士主导的，家长一般处于配合的地位。但家庭语言规划中，听障儿童家长主导语言计划扮演重要的角色。由儿童家长对听障儿童语言习得目标、习得环境、交际伙伴、语言选择、语言康复计划参与、教育、身份等方面进行计划、选择、设计，做出重要的决定，而且确保孩子的所有发展需求得到满足。

【作者简介】雷红波（1975–），女，中国新疆人，博士，讲师，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2 家庭语言规划：定义、内涵与框架

语言规划（也称语言政策）指在语言社区内影响语言或语言变体功能、结构或习得的有意识活动。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家庭中如何管理和协商各种语言及语言变体，主要关注双语和多语家庭对子女语言发展的影响，研究家长如何在子女习得多种语言过程中进行引导。当主流社会语言与家庭语言存在差异时，双语家庭都面临相似的语言选择挑战。

家庭语言规划包括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三个部分。语言意识形态涉及语言发展的目标、计划和信念，体现在语言使用方式、场合选择及价值判断等方面。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关乎语言本身，还反映了社会和个人身份认同，影响着政治、教育等领域，并通过语言规范维护特定社会群体边界。语言使用与种族、性别、社会阶层等因素密切

相关，形成复杂的身份关系。

家庭语言实践是指在家庭社会互动中可观察到的语言使用和学习行为，这些行为深受个人或群体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研究特定语言意识形态背景下的语言使用模式和种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语言规划的运作机制。家庭语言管理则涉及家庭内部对语言发展的控制和调节策略，包括语言习得、使用、伙伴和环境的选择等多个方面。Schwartz（2010）的研究发现，家庭语言管理主要表现为两种控制倾向：一是寻求外部支持性语言环境来实现规划目标，二是通过建立家庭文化传统或语言奖惩制度来控制内部语言环境。以双语教育的选择为例，这既是通过外部控制实现家庭语言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也会对家庭语言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与官方语言规划不同，家庭语言规划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是明确协商的结果，也可以是未经讨论的隐性实践。有些家庭会有意识地管理语言使用，而有些则采取较为随意的方式。这种非正式性使得家庭语言规划往往缺乏详细的实施计划，甚至可能忽视其重要性。如果没有专业指导，家庭可能在制定语言规划时感到困惑或过于简化。因此，家长通常会根据自身的语言意识形态和家庭实际需求，做出务实的语言选择和管理决策。

3 听障儿童与家庭语言规划

听障儿童家庭的语言选择与双语家庭有着本质的相似性。这些家庭除了可能存在不同的语言背景外，还面临着听说语言、手语及各种视觉模态交际方式的选择，使其不仅具有双语特征，更呈现出多模态性质。这一特点使得双语家庭语言研究的范畴自然延伸到了聋人等特殊群体的语言规划研究中。

由于听障儿童的特殊语言需求，以及这些需求对其未来教育、就业和生活的重要影响，家庭的语言规划显得尤为关键且直接。家长必须在手语、口语和书面语等多种交际方式中做出选择，其语言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孩子的语言习得、认知发展和交际能力。这包括选择合适的语言教育机构、确定交际对象和模式，以及规划学习内容、时间和标准等诸多方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工耳蜗植入技术的发展为严重听障儿童接触口语提供了新的可能，这正在改变传统的交际方式选择观念。父母需要在婴幼儿早期就做出关键决定，包括是否进行口耳适应训练（如听觉语言训练、口语训练、唇读等），采用视觉 - 手势交流，或选择语言和手语相结合的双语 - 双模态方案。这些选择都将对儿童的语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如前所述，这些管理决定必须通过实践来进行。听障儿童家长在家里往往是儿童的语言启蒙者、孩子的语言教师和语言伙伴。他们带领孩子学习语言，和孩子一起使用语言，对听障儿童的语言能力、认知能力以及社会情感交流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家长的语言意识、语言策略、语言使用以及儿童的语言发展做深入系统的调查，了解不同阶段的听障儿童家庭在语言观念、互动策略选择上的基本情况，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最终促进听障儿童的语言发展。家长的决定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些因素涉及家庭对聋人的信仰、态度、意识形态和行为，以及对手语和口语的看法。

正如很多听人家庭面临双语、多语规划时随意而为，听障儿童家庭也是如此。只是由于听障儿童的特殊需求，对语言习得和使用的选择可能会导致他们语言发展方向的重大差别。几乎每一项聋人语言的实证研究都反复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别。每一个成功或受困的语言学习者背后都是成功或失败的家庭语言规划。不过由于听障儿童对语言发展要求的特殊性和紧迫性，现在很多学者开始对听障儿童家庭进行语言规划研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规划策略，包括如何让语言训练专业人员介入家庭语言实践，结合家庭成员具体情况，为儿童语言学习提供方案设计和时间规划（Batamula 2020）。

4 听障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的影响因素

家庭语言规划并非只与家庭内部有关，也受到以下几方面条件的影响。宏观条件上受制于社会文化条件和国家的语言政策，同时也受到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特征的群体归属（如移民、种族社区），以及家庭本身的社会文化、种族和语言状况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在家庭语言的选择的决策过程与社会背景、文化、认同、情感等因素有密切关系（Spolsky 2009；Schwartz. 2010）。

4.1 儿童的听力水平和语言能力

听障儿童的语言选择主要取决于其听力和语言能力，以及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等听力技术的可及性。听人父母倾向于选择口语交流，仅在口语交流严重受阻时才会转向手语。人工耳蜗植入也主要为促进口语发展，因此植入者家庭多选择口语规划。若儿童存在其他残疾，也会影响语言规划的选择。尽管手语常被视为不得已的选择，但研究人员认为手语对所有听障儿童都有益处。手 - 口双模态的双语方法不仅促进语言发展，还有助于社会情感成长，使儿童能同时融入聋人和听觉世界认同双文化身份的聋人比自认为是听人或处于边缘化状态的聋人具有更高的自尊水平。

4.2 专业人士的意见

在听损儿童家庭的语言选择中，专业人士的指导意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听人父母将听力损失视为需要治疗的疾病，在经历确诊的情绪冲击后，往往会产生迫切的医疗需求。同时，他们需要在双模态和单语之间做出语言选择决策。作为外行的家长通常高度重视医生、听力专家及相关行业人员的意见，这些人宣传的语言理念对家长影响深远，尤其在语言习得的早期阶段。然而，“专业意见”也存在风险。听力专家不一定具备语言专业知识，有些非专业人士可能发表缺乏依据的言论，加上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相互矛盾的发现，这些混乱的信息来源给家长的语言选择带来了困

扰和风险。家长在寻求专业建议和支持时，需要谨慎分辨和权衡各方意见。

4.3 家庭语言条件

听障儿童家庭的语言规划与家人的语言能力，家庭成员的社会属性，如国家、民族、地域、宗教、社会经济、教育水平等因素都有关系。例如，家中有人会手语、外语，将这些语言教给儿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国外聋童研究中，不少与移民有关，在这些家庭中，聋童常常还面临着是否要学习本民族传承语的选择。如印度裔聋童的家庭语言选择范围就包括印地语、英语、手语，甚至手语也可能有英国手语和印度手语之别。如果聋童的父母也是聋人，那么他们大概率会自然习得手语。

4.4 国家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上，政治、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对家庭语言规划有重要影响。标准语、方言和手语在国家及地方的地位直接影响听障家庭的语言选择。据 Curdt-Christiansen（2012）的研究，国家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对家庭语言规划有显著影响。社区、政府和学校都具有潜在的语言规范，规定什么语言可用或最佳。少数情况下政府会积极推广双语教育，但更多时候，家庭会因学校和主流社会压力而放弃某些语言使用。在官方机构中，家长常需谨慎考虑语言选择，如手语使用是否恰当。当国家通过媒体和教育机构积极推广手语时，会增强使用手语的动力。相反，在强调单语的国家，非主流语言往往被贬低，其在教育、就业中的低价值会导致人们放弃使用。

4.5 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观念和态度，虽无官方政策背景，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例如，聋人社区对手语的积极态度会促进手语使用；通过媒体展示的手语表演也能引发大众对手语的兴趣和态度改变。听人群体作为社会环境的主要构成，也在不断塑造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家庭语言使用和规划会随外部环境变化而调整。据 Lanza（2007）研究，听障儿童的语言选择可能因听力状况变化、居住地改变、新朋友圈的形成、学校更换等因素而改变。尽管家庭语言规划在长期内相对稳定，但本质上是动态的，需要在家庭生活中不断协商和调整。特别是在双语双模态家庭中，语言规划、主导语言和语码转换策略都会随时间和情境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1] Batamula, C., Herbold, B. J. K., & Mitchiner, J. (2020).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with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children: Fostering multilingual development. Odyssey: New Directions in Deaf Education, 21(1), 8-13.

[2] Curdt-Christiansen, X. L., & Silver, R. E. (2012). Educational reforms, cultural clashes and classroom practic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42(2), 141-161.

[3] Lanza, E., & Gomes, R. L. (2020). Family language policy: Foundation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In S. Montanari & S. Quay (Eds.), Handbook of home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pp. 153-173). De Gruyter Mouton.

[4] Schwartz, M. (2010). Family language policy: Core issues of an emerging field.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1(1), 171-192.

[5] Spolsky, B. (2012). Family language policy – the critical domai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3(1), 3-11.